

五代史略

陶懋炳著

11.3412./9
1186127



五代史略

陶懋炳著

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倪天煦

五代史略

WU DAI SHI LUE

陶懋炳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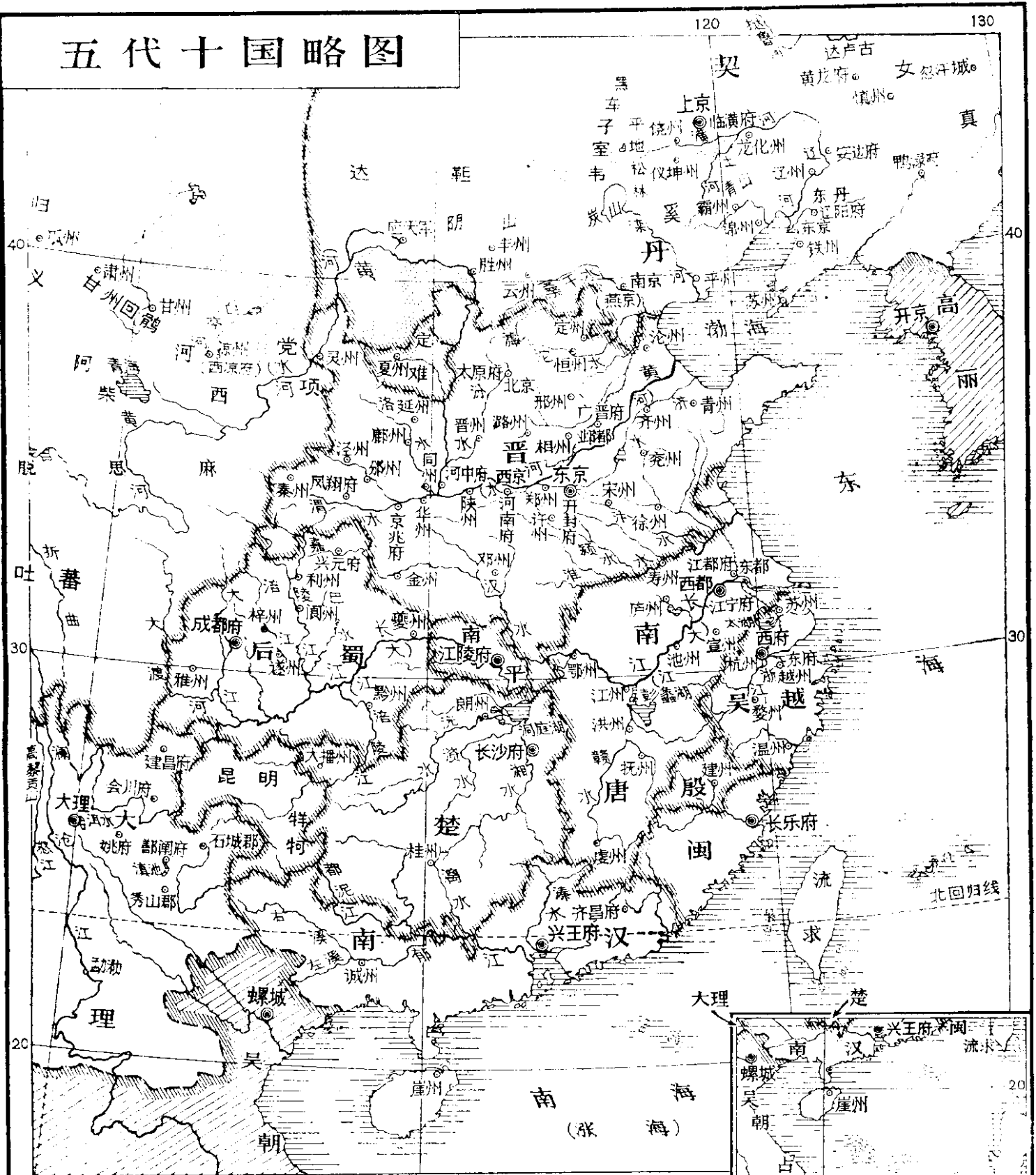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5印张 289,000字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4,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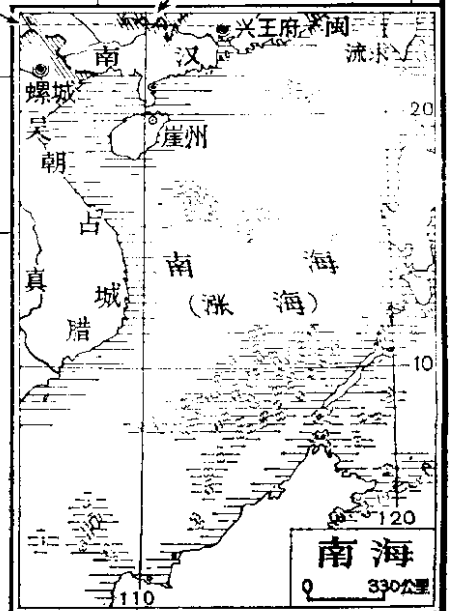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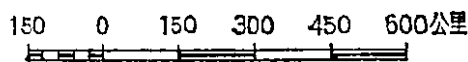
书号 11001·663 定价 2.50元

五代十国略图



本图以公元九四三年（后晋天福八年）政治形势为准。

- 东京 都城
- 京兆府 府、州级驻所
- 大播州 其他居民点
- ▨ 政权部族界



序

一般读中国历史的人，一接触到所谓“五代十国”，就会感到头痛。这期间，若以朱温篡唐（九〇七年）到赵匡义灭北汉（九七九年）来计算，实达七十余年；若按照封建史家以封建王朝的兴亡为断代标准，到赵匡胤建立北宋（九六〇年），就只有五十三年。虽然为时甚短，若从大势而言，这个时期确是晚唐“乱世”的延续。一则因中国此时政权林立，所谓十国，还只是自宋以后汉人的看法，并未包括边疆少数民族在内；特别是契丹阿保机已在后梁开平元年（九〇七年）称帝建国，在此前后，契丹对华北的政治局势影响极大，终于形成和北宋长期对峙的局势。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些都是我们多民族国家中的各个民族的政权。由于分裂割据的局势如此，故战争和篡夺频仍，天下大乱。二则因各个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大多不是世家大族，而是出身于黄巢义军及秦宗权等“流寇”的部将和久已汉化的“蕃夷”，这是汉族封建史家所看不惯的。如欧阳修的《五代史记》就不断地哀叹“呜呼”，给后人带来了更阴暗的印象。

其实，这个时期正是历史辩证运动的一个转折点，表明中国封建社会正走向一个新的阶段。自此，彻底摆脱了六朝以来世族高门垄断政权的局面，农民由于租佃制的普遍施行而人身依附得以削弱和商品经济得以较快发展，因而封建帝王的专制统治也得以进一步的加强。如枢密院到北宋即与政事堂对掌军事大权，天下

财赋也渐集中于三司。同时，文化上如诗、词等较之唐代又有新的发展。加以此时开始刻书，为宋代以后教育、文化的日益兴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如果看不到这些时代特点，就不易理解这段历史的重要意义。

由此可知，这确是一个为时虽短暂却又极为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要全面的掌握它的情况和特点，是很不容易的。陶懋炳同志这本二十多万字的书，却在各个方面画出了它的清晰的轮廓。特别是对五代十国的兴废及其相互关系能使读者一目了然。也由此可知，作者是经过长时期的深思熟虑，发现了这个历史时期的矛盾及其变化规律，再以正史、《通鉴》、类书、野史笔记以及近人和国外的研究成果而作了严密的论证的。作者长于考证^①，但此书虽有所创见，却不为新奇可怪之论；虽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治史的指导思想，却不以摘引经典著作的论述而自炫。实事求是地以深入浅出的笔法，为读者提供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全貌。不过，在科学、文化方面还微嫌不足，这是不是我的苛求？

陶懋炳同志和我相识已四十多年，我深知他酷好隋唐五代史。虽在解放前艰危困苦的岁月中，而读史之志不渝。现在我读了这部书稿，高兴之余就写了这一点读后感，未敢自以为是。反正学术为天下之公器，读者自会对此书作出公允的评价，就不容我饶舌了。

熊 德 基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日

^① 如他的《王薄事迹考》，对这位隋末首先起义的农民英雄，从无人知其去向，而此文终于钩稽出他的遭际。（此文刊于《湖南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目 录

序	熊德基 (1)
前言	(1)
第一章 唐朝覆灭和后梁、后唐的嬗替	(13)
第一节 藩镇混战与唐朝灭亡	(13)
(一)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回顾	(13)
(二) 唐朝的末日	(19)
(三) 两大镇争霸与后梁建国	(32)
第二节 后梁和后唐的兴替	(49)
(一) 后梁建国与形势的转变	(49)
(二) 夹河相战与后梁灭亡	(56)
(三) 后唐庄宗的倒行逆施及其覆灭	(69)
(四) 短暂的“小康之局”与后唐的灭亡	(82)
第三节 梁、唐两代经济和社会结构、官制的部分变化	(90)
(一) 后梁、后唐社会经济的曲折发展	(90)
(二) 唐末以来社会结构的变化	(101)
(三) 梁、唐官制的变化	(107)
第二章 南方的相对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114)
第一节 江淮两浙的短期混战与割据政权的建立	(115)
(一) 江淮残破与浙东混战	(115)
(二) 吴和南唐的嬗替	(122)
(三) 吴越建国于钱塘	(134)
第二节 闽、粤出现的封建割据政权——闽和南汉	(138)

(一)	刘氏据岭南建南汉	(139)
(二)	王氏入福建, 建立闽国	(142)
第三节	割据两川的前蜀和后蜀	(145)
(一)	唐廷入川与蜀中大乱	(145)
(二)	王建称帝成都, 建立前蜀	(150)
(三)	前蜀覆灭, 孟氏建后蜀	(156)
第四节	两湖的马楚与高氏南平	(163)
(一)	湖南混战与马殷建楚国	(163)
(二)	马楚与境内诸族的交往	(169)
(三)	高氏据荆南	(174)
第五节	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78)
(一)	劳动力的增长与农田水利的发展	(178)
(二)	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188)
(三)	商业的活跃	(197)
第三章	契丹的崛起与中原人民的抗辽斗争	(206)
第一节	契丹的崛起与建国	(206)
(一)	契丹族的发展和阿保机建国	(206)
(二)	契丹的政治经济	(211)
第二节	契丹南侵与被逐出中原	(215)
(一)	石敬瑭投靠辽主, 甘当儿皇帝	(215)
(二)	辽军南侵与中原人民的抗辽斗争	(225)
第三节	刘知远夺取胜利果实和后汉的速亡	(244)
(一)	刘知远称帝与后汉的残暴统治	(244)
(二)	后汉覆灭与北汉小王朝的出现	(252)
第四章	统一趋势的发展和后周的改革	(262)
第一节	南方形势的变化和南唐统一计划的失败	(262)
(一)	闽、楚的覆灭	(263)
(二)	南汉的残暴统治与张遇贤领导的岭南农民起义	(278)
(三)	南唐统一计划的失败与南唐、后蜀的衰落	(283)

第二节	统一因素的增长与后周二主的改革·····	(294)
(一)	恢复生产 发展经济·····	(299)
(二)	改革朝政 振饬纲纪 调整机构·····	(313)
第三节	杰出政治家后周世宗的统一活动·····	(329)
(一)	初次北伐 整顿禁军·····	(330)
(二)	策划统一 西取四州·····	(335)
(三)	三驾江淮 二次北伐·····	(338)
第五章	五代的周边各族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350)
第一节	周边各族与内地的交往·····	(351)
(一)	东北各族·····	(351)
(二)	西北各族·····	(354)
(三)	西南诸族·····	(358)
第二节	五代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360)
(一)	高丽、新罗和日本·····	(361)
(二)	海南诸国·····	(362)
第六章	五代十国的科学文化·····	(364)
第一节	科学技术·····	(364)
第二节	史学与佛教·····	(367)
(一)	史学·····	(367)
(二)	佛教·····	(370)
第三节	文学与艺术·····	(373)
(一)	文学·····	(374)
(二)	绘画·····	(380)
附录	五代十国年表·····	(384)
后记	·····	(393)

前 言

自公元九〇七年朱全忠废唐建梁（史称后梁），至公元九六〇年赵匡胤陈桥兵变，篡周（史称后周）建宋，这段时间，史称“五代”。与此同时，南北各地又曾前后出现一批割据政权，史称“十国”。这本是宋代史家所用的名词。

五代十国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割据分裂时期之一。在它之前，曾经出现三国、十六国、南北朝这几个割据时期。五代十国与前代相比，有什么共同之处和差异之处？为什么五代时期比前代割据历时要短？又为什么它会是中國封建社会历史上中原地区出现的最后一个分裂割据时期？这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这是符合中国历史真实情况的精辟之论。在封建社会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各地区分割闭塞，这就是封建割据的客观条件；即使在统一的封建帝国中，也必然保留着某种程度的割据状态，而且，割据的潜在因素，是一直存在的。不过，仅有以上条件，或者说，仅仅有潜在的封建割据因素，并不就必然能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证明，封建国家统一的时间要比分裂割据的时间长得多。显然，由潜在的因素转化为分裂割据的局面，还要有别的因素。这些因素很多，各个时期都有不同。而其中最主要的

因素则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衰落，不但无力控制地方，反而受制于地方军阀，乃至为封建军阀所废弃（或者为内迁的少数族贵族所攻灭）；同时，各地割据势力之间，暂时又没有形成能够吞并其他割据势力的强大力量，于是呈现了鼎峙之局。三国、十六国、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出现，莫不如此。可以说，这就是各个封建割据分裂时期的共同处。

但是，五代十国与前代相比，又有差异。

一、封建经济结构有所不同。表现在封建土地的经营方式上，前代是以士族地主的大庄园经济占支配地位，而五代十国则是以庶族地主的庄田经济占支配地位。魏晋南北朝的封建大庄园是由汉代世家豪族以坞壁形式的封建庄园发展而来，各级士族和地方豪强，凭恃先世所分割的土地和劳动力，一身兼庄园主、军政统治者和封建大族长，庄园之内，奴役着注家籍的成千上万的农奴家庭，即部曲、佃客、荫户、徒附之类，既为农奴，又为私兵；他们还封占山泽，垄断一方。隋末农民战争以后，本已衰落的封建大庄园普遍土崩瓦解。整个唐代，庄田的经营方式逐步取代了这种封建大庄园。也就是说，封建土地私有程度的增加，劳动者所承受的超经济强制相对减少。经过了唐末农民战争，这种变革算是完成了。与此相关联，魏晋南北朝的封建大庄园是高度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因而，商品经济萎缩，远不能与秦汉相比。那时虽有商业活动，但主要是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奢侈品，而以物易物的现象十分普遍，货币地位大大下降。五代十国则不然。即使在战争频繁的中原地区，商业仍然活跃，贸易的货物虽然仍以奢侈品为大宗，却还有相当数量的生活必需品。无论是中原的五代，或者是南方的九国，商税都是国家收入的重要部分，而经营商业的人，包括了上自后妃，下至官吏的大小封建贵族、官吏，巨商大贾又多是倚靠各地封建政权的统治者才能贸易各地，牟取暴利的。

二、社会基础也有差异。这是与封建经济结构的差异密切相关的。三国是东汉末年州牧割据的发展。而东汉末年州牧割据的由来很久。由于皇权和世家地主(以外戚为代表)的矛盾而出现了外戚与宦官之争,因而地方名流在这个空隙中间成长起来,通过征辟、选举等途径跻身于仕途,而且逐渐形成了豪族强宗之类的大庄园。其中最称显赫的如南阳袁氏、弘农杨氏这样一批“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名门望姓,就成了后世士族地主的先驱。而各地州郡长官和掾曹佐贰,正是胶结漆固的庄园主集团,他们结为君臣,共享祸福,形成盘根错节之势。这种半割据状态,一旦遇到中央势力衰落的时机,便立即发展为州牧割据。东汉末年割据的“群雄”之中,“四世三公”的袁绍、袁术,出身宗室、名列“八厨”的刘表,依靠宗族部曲武装起家的曹操和孙坚父子,都是此类人物;就是他们部下的谋士武将,绝大多数也是这类人物,吴国的周瑜、鲁肃、陆逊、顾雍、张纮,魏国的曹洪、曹仁、荀彧、荀攸,蜀汉的马超、法正、许靖之流,皆是其选。

三国、西晋形成了士族地主的支配地位。声势显赫的士族领袖人物,不仅成为封建王朝的支柱,甚至封建皇帝也要赖其提挈。东晋元帝朝“王与(司)马,共天下”的谚语,元帝“寄人篱下,心常怀惭”的慨叹,正是典型事例。即使是内迁的少数民族的封建贵族建立政权,也不能不依赖他们的支持,匈奴刘氏建立的前赵,羯族石氏建立的后赵,鲜卑慕容氏建立的前燕,氏族苻氏建立的前秦,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哪一个政权不是倚靠了汉族门阀世族的支持?因此,王、谢、袁、萧和顾、陆、朱、张显赫于江左,崔、卢、王、李、郑骋势于中原。当然,十六国和北朝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这就是内迁的少数民族封建贵族。经历了三百年左右的民族融合过程,汉族与内迁各族的民族界限逐渐泯灭,尤其在北魏孝文帝改制以后,鲜卑贵族成为“虏姓”士族,与中原门阀世族互通婚姻,北周形

成的关陇士族，便是“虏姓”与“郡姓”结合的混合体。隋朝的统一，正是在士族势力衰落、民族融合告一阶段这两个条件下出现的。

入唐以来，士族和庶族的斗争激烈进行。隋末农民战争以后，关陇士族依然声势显赫。经过几番斗争，关陇士族受到空前未有的沉重打击，士族与庶族逐渐揉合，同时，又结党相争，形同水火。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孤寒无党”的“蕃将”被擢升为雄踞边区、成为手握军、政、财、刑大权的节度使，“安史之乱”由是而生。此后，节度使遍及中原，呈现了半割据状态。这批节度使不外出身寒微的庶族和“归化”的“蕃将”，唐代中兴名将郭子仪和李光弼，恰恰是这两类人的代表，而当时的藩镇不是安史旧部，就是郭、李部属。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政和朋党之争都是与士族和庶族的斗争相关联。就总的趋势来说，是士族与庶族的合流，形成势官地主阶层，它在宋代称为“形势户”。但在唐朝后期，封建大庄园的经营方式仍有少量存在，士族地主还有相当的政治能量，至于在意识形态方面，则反映更多，谱牒之学一直盛行于有唐一代，就是明证。由于唐朝廷还能确保江淮、巴蜀的财赋收入，又由于藩镇间势力不相上下，各镇内部矛盾更为复杂，各种矛盾交相制约，唐朝的统一局面就靠这些条件得以苟延。

唐末农民战争打破了这种沉闷的局面。“朱门甲第无一半”，“天街尽踏公卿骨”，士族和庶族显贵结合而成的势官地主势力受到惨重的打击。在镇压农民起义军过程中，新兴的藩镇压倒了旧藩镇，藩镇之间旧日的相对平衡被完全打破。唐朝廷不但失去了江淮、巴蜀的财赋收入，而且内部矛盾重重，仰鼻息于强藩，受他们的操纵控制。这样，半割据转为割据之局，徒有其名的大唐帝国终于覆灭，出现了大分裂的局面。然而，也恰恰在这时，出现了新的生机。

五代十国是唐代藩镇割据的发展，又是由长期僵持之局转向

统一局面的过渡时期。它是封建军阀称王称帝的年代，藩镇和帝王是一体之人。他们的出身比唐代藩镇还要“等而下之”：朱温（全忠）、王建出身流氓，李存勖出身沙陀贵族，而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都是出身卑下、连姓氏都没有的沙陀军人，郭威是黥面皇帝，高季昌是家奴封王，钱鏐家族找祖宗才找到了家奴出身的唐朝功臣钱九陇，杨行密出身走卒，李昇是流浪孤儿，王潮兄弟出身农家，南汉刘氏是波斯商人后裔。所以到了赵匡胤建宋称帝，把例行使用的古代祭器俎豆之类废掉，公然说：“吾祖先岂识此乎！”至于文人，虽有极少数士族遗孽和相当数量进士出身的人物，但他们并非凭借门第或者科举而致位卿相，只不过是投靠藩镇，屈居幕僚，随着镇帅升为天子，他们也就攀龙而跻卿相；而且，即使他们位居宰辅，也只能看武夫脸色、听将帅驱呵，保其禄位而已。所以，五代十国的社会基础与唐朝是颇有差异的，就是说，它改变了唐代士族与庶族新贵合流为势官地主的状态，此后的势官地主又是另一代新人了：在五代是挥舞长枪大戟的武人和听其支配的官僚，在宋代则又是以科举出身的士人为主了。

史学界有些同志每每称后唐、后晋、后汉三朝为“沙陀三王朝”，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可以商榷的。虽然这三个王朝都是沙陀军人当皇帝，但却与十六国、北魏不同，与此后的辽、夏、金、元、清更不同。这是因为，首先，他们没有对汉族采取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后唐明宗甚至因自己是“蕃人”而有自卑感，觉得不足以为天下共主。其次，后唐冒称唐室后裔，施行唐制，晋、汉踵行不改，虽然也保存了扑马、祭天神等习俗，但它毕竟不是政策法规。尤其重要的是，三朝都不曾形成一个以沙陀封建贵族集团作为王朝统治的核心力量，而是不分蕃汉，一体使用，实际上起决策作用的人物如郭崇韬、任圜、桑维翰之类，都是汉人。可见，它们与汉族地主所建的王朝并无区别。

三、就割据政权分布的状况看，与前代大不相同。东汉末年，州牧割据，群雄角逐，北方终为曹操统一，刘备则据有巴蜀、汉中，兼括南中，而东南则自孙吴盘踞后，其领域南及闽、粤，迄于吴亡，始终不曾分裂。西晋而后，北方先后出现了十六国，东南则全是东晋所占有。南北朝时期，北魏统一北方，后来分裂为东魏、西魏，东魏为北齐所代，西魏为北周所代。南方则是，刘宋代东晋，南齐代刘宋，梁朝代南齐，梁又为陈所代，这样递相承袭，而南方始终在一个政权统治之下。至于侯景之乱以后出现的西梁，不过是北朝附庸而已，也可以说是北周势力向南推进的产物。五代十国则不然。中原五代历时都不久，后梁十六年，算是最长的，后汉仅仅四年，为历代王朝中寿命最短的。而在南方，吴越八十四年，吴四十六年，南唐三十九年，楚五十七年，闽五十五年，南汉、荆南各五十七年，前蜀三十四年，后蜀四十年。历时最短的前蜀也比五代中任何一朝要长。这是由于南方诸国“保境息民”政策所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方割据政权之多，前所未见。两蜀且不必论，而从来是一个政权统治下的长江中下游和闽、粤地区，却出现了吴和南唐、吴越、楚、闽、南汉、荆南七个政权，或者说，同时存在六个割据政权。故师史学前辈李剑农先生精辟地指出，这是唐中叶以来我国经济重心南移，东南各地经济有了重大发展的反映。这是极有说服力的论断。否则，怎么可以理解，在唐中叶还相当落后的福建，能够养得起闽政权下的那批数量庞大的贵族、官僚和军队呢？

四、五代是中国封建制时代中原地区出现的时间最短的割据时期，也是中原地区的最后一次割据。三国时期如果从公元一九〇年董卓之乱算起，至公元二七九年西晋灭吴，历时九十年。“十六国”和南北朝自公元三〇四年西晋灭亡，迄于公元五八九年隋文帝灭陈，完成统一，历时将近三百年。五代自公元九〇七年后梁建国，至公元九六〇年北宋代后周，共五十三年，这只是中原王朝的

更替，如果下推至公元九七九年宋灭北汉，完成中原地区的统一，也仅七十三年。而且，五代十国之后，中国的边疆仍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此后又有辽、宋对峙和宋、金对峙，但这种情况与上面所说的几个时期是不同的。辽、宋对峙，可以说是由辽和宋分别统一了边疆和中原，虽然同时也存在西夏、大理以及回鹘诸政权、吐蕃诸政权，这类情况在历史上的统一诸朝中，几乎都有。至于宋、金对峙，确乎有些象南北朝，但是，无论十六国和南北朝都是中原地区自行分裂，形成割据。建立割据政权的内迁民族，都是迁入较久，并且是在中原“创业”、“建国”的，匈奴、鲜卑、氐、羌、羯，都是如此。金朝则不然，它是女真贵族于原居地完成部族的奴隶制变革、建立政权之后，逐步侵入中原的，它不是中原自身分裂的产物。所以，两个“南北朝”，貌似而神异。五代历时最短，而且从此中原地区自身不再分裂，这都不是偶然的。东汉后期出现的士族地主和他们经营的封建大庄园，对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王朝具有很大的离心力，三国时期正是他们发展壮大的阶段。所以，依靠门阀世族为支柱的西晋王朝就享年不永。此后近三百年之间，在士族势力由盛而衰的形势下，经过了重重灾难，统一才能重现。五代就不是这样了。分散的庄田，出自凡下的庶族地主，只能依靠强有力的封建国家来保障他们的利益，而不足为左右皇权的社会势力。尽管在一段时间里，握有重兵的封建军阀可以要挟朝廷，甚至称王称帝，但这种趋势终究不能长久。所以，五代王朝象走马灯似的更换，藩镇们的财富更是朝夕易主、瞬息转手，封建秩序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物极必反，统一代替了割据，而中原地区自行分裂割据之局从此基本上不复见于中国封建制时代的历史。

我师熊德基先生对五代的历史作了一个精赅的概括：“表面上乱，实质是变。”确实是一针见血之论。把五代十国看成是混乱、倒退的“黑暗时代”，可以说是受了宋代文人陈腐观念的影响。就整

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来考察,五代十国是一个大震荡、大变革的时期。从此,士族地主的影响荡然无存,劳动者由农奴身分转向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的农民身分。从此,势官地主换上了以科举出身为主的人物,汰除了士族残余和袭其旧风的官僚、藩镇。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封建割据的因素而增强了统一的基础。从五代十国本身来看,固然有社会经济和文化遭受严重破坏的一面,但同时又有它们得到发展的另一面,在南方,这后一方面应当还是主要方面。否则,为什么南宋能够建都临安?为什么福建成为宋代的重要财赋之地?而福建人又为什么会在宋代的政治舞台和学术园地中崭露头角?为什么“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宋代文学家都是南方人?又那么凑巧,江西、四川各占三名?这些问题都绝非偶然的巧合。我们可以认为,五代十国是中国社会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的重要时期,又是中国封建制时代文化重心南移的开始。

为便于读者了解五代十国更替简况,附表于后。